

学津清谈

——讲座丛书第三编——



寻求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

▶ 潘常青 主编 ◀

Xunqiu Neiwaipingheng De Fazhan Zhanlue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学津清谈

——讲座丛书第三编——



寻求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

主 编 潘常青
编辑组 金 龙 陈 琳

圖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求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 / 潘常青主编.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7

(国家图书馆讲座丛书·学津清谈)

ISBN 978-7-5013-4386-7

I. ①寻… II. ①潘… III. ①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文集 IV. ①F12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7412 号

书名 寻求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

著者 潘常青 主编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9.75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978-7-5013-4386-7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中国经济的“崛起”还是“再崛起”？

——从宏观历史看 / 丁学良 / 1

改革开放三十年 / 马立诚 / 9

寻求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 / 何 帆 / 22

文明演进与经济转型 / 叶文虎 / 34

三十年法治进程的轨迹和曲线 / 江 平 / 46

世界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应对 / 华如兴 / 56

文化产业的创新与盈利模式的探索 / 陈建国 / 67

用统计数据解读 2009 年世界经济 / 文兼武 / 81

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选择与发展前景 / 赵春明 / 92

对“中国经验”的几点社会学解读 / 郑杭生 / 101

论实效主义的改革哲学

——以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为例 / 柯华庆 / 115

金融危机后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 金灿荣 /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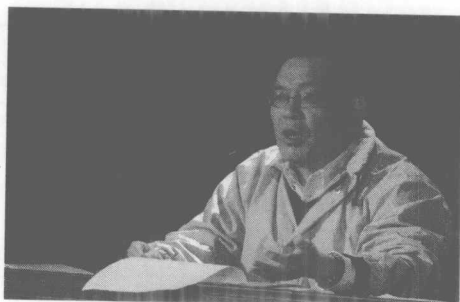
重建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 金元浦 / 136



丁学良

中国经济的“崛起”还是“再崛起”

——从宏观历史看



主讲人简介：

丁学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曾任职于哈佛大学本科生学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顾问。

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崛起’还是‘再崛起’”。特别强调的是“再”字。最近这些年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对中国兴起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都是很热门的研究课题，国外每个月至少有一到两本书是在研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这种高速发展对国际关系、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在重要的英文报纸和刊物上讨论中国的崛起或者兴起的评论每个星期都有好几篇。在我们国内，对国际上研究的翻译介绍也很多，国内的学术界、传媒界差不多每天也都会用到“中国的崛起”这个概念。

在过去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之中，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用更准确的概念表述应该是“再崛起”而不是“崛起”，一字之差表明了一种比较的观念和历史的观念。

所谓比较的观念和历史的观念，是指从长期的国际经济发展的资料来看，或者是把中国经济同其他的主要经济体进行比较。为什么用“再崛起”这个概念才更准确呢？根据国际上的统计数据，在过去将近30年的历史中，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8.6%，这和国内的统计数字有一点差别，因为国际上的统计数字不仅仅采用中国官方的数字，还会参照其他的一些侧面数字。在将近30年里保持年均增长速度8.6%，这是人类有确切的统计记载以来，唯一的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保持这么高的水平，比较小的经济体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长期高速度发展，比如说以前的“四小龙”。全世界能够像中国一样，在过去近30年来持续发展的大经济体只有日本，日本从二战结束以后直到90年代初期，保持了全世界大的经济体中最持续的高速度增长。

JANUARY 2008

004

学
津
清
谈

中国经济发展 20 多年来取得的总体成就，虽然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以及国际上所有关心中国的国际友人自豪并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对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不应该过分的头脑发热。全世界研究国际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数据库作者是 Angus Maddison（安格斯·麦迪逊），根据他的数据可以看出，直到 187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大于美国，所以从 GDP 的总值来讲，一直到 1870 年，中国都是世界上的第一号经济大国。如果仅仅以工业品做比较，1860 年中国的工业产出占全世界的 19.7%，而当时的美国只占 7.2%。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当时中国人均生产力很高，而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人口总数都是美国人口总数的 10 多倍。

有一位英国的 BBC 经济事务主编在 2005 年 3 月份的时候写过非常有趣的评论。他说中国曾经作为一个经济和文化大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西汉时期的经济总产值就已经占到当时世界经济四分之一，1000 年以后到了宋朝，中国的经济总产值稍微有一点下降，但仍然接近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中国在 1820 年到 1830 年这段时间，占全球的 GDP 比例最高，几乎占到全球三分之一的水平，这位英国主编用的资料也是安格斯·麦迪逊的团队整理出来的。

中国的急剧衰弱是在 19 世纪下半叶，不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大事，中国经济还是按照常规在发展，问题在于欧洲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赶上这一步。欧洲有了非典型的经济增长，革命就是非典型，就是非常规，而中国还处在常规增长模式上，所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只占世界经济的 5%，这个跌落表明相对衰减是触目惊心的。在 70 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从世界经济的 25% 降到了 5%。到 1973 年，中国经济总产值只占世界经济的 4% 左右，还不如 1950 年的经济情况。在西汉，如果按照 1990 年的物价标准来算，中国人的年均收入已经达到了 450 美元。而到了 1950 年，虽然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大幅度上升了，但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同 2000 年以前相比，反而还降了一些，只有 430 美元，这也是按照 1990 年的物价基数推算出

来的。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醒悟过来，于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快速地追了上来。以目前的统计数字来看，中国现在的GDP大约占世界总数的13%到14%，这些资料说明，中国过去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很值得我们自豪，但是我们不要头脑太发热，因为我们即便到现在为止，还比不上100多年以前的中国。

我强调的“再崛起”的含义还不仅仅是讲这些数字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在历史上，中华文明曾经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两个文明中心之一。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再崛起”基本上是经济上的“再崛起”，还不是全面的“再崛起”。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不仅给全世界提供最多的物质产品，同时也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软力量，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科学、文化、艺术和语言。比如，唐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达到顶峰的时期之一。在西方比较历史学大师们看来，唐代中国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等的制度，它们不仅成为了唐代的标记，而且直到20世纪，在很多方面还继续影响着中国周边的文明，比如日本、朝鲜和越南，为他们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所以在中国的东北、西南和南部都是一些仿效唐代中国的稳定独立国，他们的文化深受中国影响。目前中国高速发展所欠缺的一面，就是在社会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社会总体文明的这些方面，所提供的示范效应远远比不上唐朝。

在今天世界上，整体文明的示范力意义变得越来越大了。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涉及面越来越广、涉及的层次越来越多，这个过程是无法阻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取得了伟大成就，最突出的一点是，我们使中国人口中70%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民脱贫。现在中国还是有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但是这个比例和3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地缩小了，而且随着中国综合经济能力的提升，再进一步使剩下的这些贫困人口脱贫，我们需要花费的时间不会那么久。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常有人问中国下一个30年该怎么办。

2015-2016-2017-2018

学
津
清
谈

006

下一个30年我们有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在经济技术的层面上，不能再主要依靠引进和模仿。模仿包括合法的模仿和非法的模仿，非法的模仿就是违反知识产权的做法。未来的30年中国要想能够在发展上更上一个台阶，最重要的是在技术层次上和经济层次上成为一个自主创新的国家。自主创新的国家同引进复制的国家之间差别很大，不是量的差别，是质的差别。举个例子，30年以前，中国当时在国际上100多个国家的排名中，可能属于第90名。这也意味着在引进和抄袭的时候，前面有89个是样板。30年后，中国已经从世界上第90名上升到40名了，这意味着前面能够给你复制和抄袭的只剩下39个了。当你越往前移的时候，前面可以被复制和引进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这也意味着越来越依赖自主的创新，否则经济技术的进步就失去了根本动力。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最在乎的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下一个30年，不能再把引进和复制作为中国经济技术进步的最重要的动源，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第二个指标是中国能够在30年以后，在2038年或者2040年的时候，在整体文明的透射力和示范力方面，对周边国家乃至对遥远的国家，起到很大的影响，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华文明的成员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今天专门带来了一个研究报告，题目是《大学制度与创造性的经济》。要想使中国在下一个30年的发展中，能够在经济和技术层次上变得富有创造力，在中华文明整体的示范和透射能力方面有很大影响，最关键是要抓住三个要素“T”：

第一个要素T，Technology（技术）。这里的技术是广义的技术，不仅仅讲设备，还包括我们通常不认为是技术的一部分。在过去，中国有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对外引进技术的时候，最重视的通常是硬件，主要购买别人的机器和设备，而对同机器、设备相关的软技术很少购买。技术不仅仅是先进的机器和设备，还包括软件的部分。我们看到，每年中国政府对技术投入是越来越多了，同时还要关注到公共资金投入到了技

术开发方面的效益。2007 年的相关报告说中国、印度和美国，每个国家用于投资的总量占 GDP 的百分比分别是：美国 19.1%，中国 36.1%，印度 24.8%。换句话说，在美国，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大部分都回馈到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去了，而中国大部分留下来再投资。当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肯定应该保持长期投资，但是国际上经常讲，中国投资的太多，消费的太低；信息技术、信息服务占出口的比例方面，印度比中国要高。中国的 IT 只占中国出口量的 38.3%，印度是 66.4%，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上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印度是世界的办公室；中国的研究发展投资占 GDP 的 1.44%，美国占 2.68%，美国的经济体比我们大好几倍，比例比我们高很多，2004 年全世界主要的专利都到美国去注册，因为它的专利注册程序在世界上是公认的。2004 年中国注册了 597 项专利，美国注册了 94110 项，中国在国际上登记的专利花费了 4660 万美元，美国在国际上登记专利只花费了 330 万美元。换句话说，美国在研究发展方面投入的效率是中国的近 15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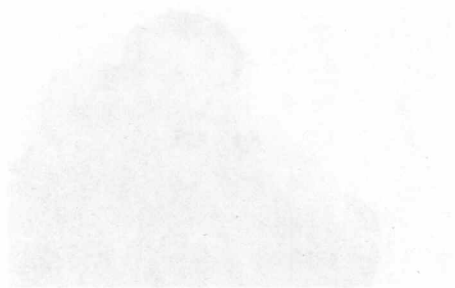
第二个要素 T，Talents（人才）。好的技术就要有的人才。香港政府或者香港财团的主要决策者们，从第一个 T 到第二个 T 的认识转变花了 15 年。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在外国专家的反复劝说之下才转变了认识。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带越来越成为国际大公司进行制造业投资的地方，香港面临着制造业空洞化的问题，从国际上请了很多的专家提对策。为什么伦敦、纽约、波士顿、东京、美国西部海岸这一带没有衰落反而还在蓬勃发展呢？是因为这些地方有非常好的研究性的大学、研究性的机构，他们把原来只看重制造业的发展策略、发展眼光，转移到注重创造性的经济上来。创造性的经济就是培养人才，大学需要办得更好。因此在 1989 年，香港政府拿出财政结余 19 亿美元办了一所研究性的大学，就是香港科技大学。我觉得更难转变观念的是在大陆地区，要把学校办好，对学校、对教育的投资要持续，而且要投在关键点上。国内有很多大学漂亮得就像购物中心，图书馆外部造得就像大博物馆，但是里面的座位却不够。所以国外评大学图书馆有两个硬指

2008.03.29.008

标,即图书馆里面的藏书量以及书籍的循环周转率。因此要培养人才,就要做好教育研究,关注研究成果如何完成商业转化。这些方面要花很多经费,钱要花在这些关键的环节上。

第三个要素 T, Tolerance (宽容)。这里讲的不是狭义上的概念,是一种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人和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组织机构对待个人的雇佣、提升、奖惩的制度,是社会结构对不同类型的个人所提供的创造性的工作条件和机会。因为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认识到人才是宝贝,全世界争抢人才最成功的几个国家也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但是人才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人才始终是进行破坏性的创造,他不是为了破坏而破坏,而是创造过程必须先有破坏,必须对以前被认为是应该的、合理的、有效的、正确的、天经地义的东西进行破坏,不管在技术方面、科学方面、生产方面、生活方式方面,还是在组织方式方面等,要创造出更好的,所以要先破坏。一个从来不进行破坏的人才,肯定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因为他没有提出更新的东西;第二个特点,人才始终是非常挑剔的,人才非常挑剔是因为人才非常敏锐。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使得人才在很多时候被人讨厌,因为他老是弄得周围不得安宁,有时候影响安定团结。人才的这两个基本特点是天下通有的,越是了不起的人才越是奇怪。所以对待人才不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还包括一个社会的法律、政策、条例、组织系统、奖惩制度,包括态度和观念,对待那些有创造性的个人和有创造性的小团体应给予稳定的保障。所以这些研究报告指出,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研究机构、最好的实验室就是最最宽容的地方,很多人才在别的地方没办法呆下去了,就去这些地方落脚。全世界幸亏有相当多的地方提供了更宽容的大小环境、大小气候、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条件,才为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提供了环境。

(讲座时间:2008年3月29日)



马立诚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主讲人简介：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98 年，与凌志军合作撰写的《交锋》《呼喊》，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当年中国最畅销书。《交锋》发行 200 万册，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1999 年，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 50 人之一。

改革开放 30 年，气象万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我提出一个思路 and 框架，梳理和概括 30 年的历程。这就是“三十年来的四次大争论”，也就是四次大突破。提出这样一个框架，也许能够从一种角度帮助朋友们把握 30 年的光辉历程。

有学者说是三次大争论，这是从偏重经济领域着眼的。如果把政治、文化、经济各领域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是四次大争论：第一次争论是从 1977 年到 1978 年前后。争论的内容是，“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第二次争论是从 1989 年下半年到 1992 年，争论的内容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第三次争论从 1995 年到 2002 年的十六大，争论的内容是，私营经济是祸水还是活水？第四次大争论是从 2004 年一直到十七大，争论的内容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搞错了？

这四次争论有两个特点：一是过去的争论，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到今天利益的博弈凸现出来，另外在改革的技术层面也有争辩，比如医疗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有时，这三者交织在一起；二是过去往往一锤定音，今天是多种声音的表达和平衡。

一、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

1976 年底，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个月，很多人提出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的职务。“三副一正”是指邓小平“文革”后期复出时，在 1975 年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四个职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呢？1976 年 3 月底 4 月初，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1977 年

9787309055428

012

学
津
清
谈

2月7日，经华国锋主席批准，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这三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最高宣传权威。社论一出来，大家就知道这是中央最新工作方针。这个社论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当时尚未复出的邓小平批评了“两个凡是”。

两个月之后，在党心和民心支持下，邓小平恢复了“三副一正”的职务，但是“两个凡是”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针对“两个凡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最先是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我简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诞生过程。

当时，中央党校开展了一个活动，就是总结“文革”期间的“党内路线斗争”。怎么判断路线斗争的是非呢？学员中出现了两个标准，一个是以毛泽东指示为准，还有一个就是以“文革”的实践为准，这两个标准显然矛盾。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党校研究室决定写一篇文章，提出判断是非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这就是实践。由孙长江执笔的这篇文章接近完成的时候，《光明日报》送来一篇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请党校帮助修改。最后孙长江把两篇文章综合在一起，就整合成了见报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单纯阐述理论，它的现实针对性很强。比如文章说：“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当时的“凡是派”人士猛烈指责。当时压力非常大，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支持。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期36天。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北京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通稿，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接着，在会议上，围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又展开了长时间激烈交锋。辩论的结果是，“两个凡是”失败了，实践

标准获胜。在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全会公报还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要着手认真改革，这是在中央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公报还说要努力采用各国先进技术经验，这就是开放。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三中全会还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经过第一次大争论，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我举出一些标志性人物和事件作一些说明。

第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推倒冤假错案，为大批老干部平反，也为民间人物平反。同时，为地主、富农、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

第二，小岗村包产到户。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当家人代表20户农民立下生死契约，开始包产到户，后来取得成功，并在全国推广。

第三，成立特区。1979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来北京开会，要求创办特区，得到邓小平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和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江泽民也都大力支持，才有了特区的今天。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制度改革的命题，批评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等五个弊端。

第五，个体、私营经济破土而出。“文革”中1600万城市青年到乡下去，跟农民竞争工作岗位，这与“城市化”是刚好相反的。1600万人后来回城，没有工作，被逼无奈，就自己谋出路，裁缝、修车、大碗茶等个体户，就这样诞生。这些举措，当时被有些人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